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599-07

# 德国与欧洲货币体系的创建

张 才 圣

[摘 要] 虽然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是欧共体的既定目标,但在国际金融动荡的 20 世纪 70 年代,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利益不同是其难以建立的重要原因。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低潮,这对德国极其不利。欧洲一体化是德国二战后主要的外交目标,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维护其根本利益。于是,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妥协与让步,在创建欧洲货币体系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为维护欧洲统一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 德国;欧洲货币体系;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K516.5 [文献标识码] A

1969 年 12 月,欧共体六国在海牙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把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货币联盟作为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国际金融危机沉重的打击下,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确非易事。虽然德国竭力建成“蛇行于洞”的联合浮动汇率机制,结果是“蛇”走“洞”破,而这正是共同体缺乏“领导者”造成的后果。德国总理施密特上台之后,在“新东方政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和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大力协助下,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际金融动荡的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货币体系对稳定共同体内部汇率、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加速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 一、临时性浮动汇率机制的建立

随着共同市场的建立,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激增。但共同体各国的汇率不稳定,对成员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例如,1969 年 8 月,法郎贬值使德国农产品价格飙升 40%,也使共同农业政策几乎成为空中楼阁。1968 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欧共体经济,更加剧了欧洲金融市场的混乱。有鉴于此,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发展共同体内部贸易和巩固关税同盟,实现共同农业政策成为共同体的迫切需要。1971 年 3 月 22 日,欧洲理事会出台加强欧洲经济联合的“维尔纳报告”,要求各成员国采取联合行动,缩小汇率波动幅度等。“维尔纳报告”设想的是欧共体货币一体化,主要是通过缩小成员国间汇率波动幅度最终实现固定汇率,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欧洲统一货币,达到成员国的货币和资本在共同体内部自由流通等目的。“维尔纳报告”的目标可谓十分远大。

但 1971 年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维尔纳报告”试验阶段蒙上了阴影。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前一年经济政策由降低通货膨胀转向刺激增长和减少失业要求降低利率造成的”<sup>[1]</sup>(第 102 页)。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导致大量投机资金流出,货币坚挺、马克不断升值的德国成为投机资金的主要流入地。美国听任大量美元流入欧洲的目的是迫使欧洲分担其经济压力。由于美元投机资金在欧洲主要是流入德国,因此德国承受的压力最重。在德国国内,对付金融货币危机有许多不同意见。有的认为,维持好共同体成

员国间的良好关系最为重要;有的则担心联合浮动汇率将会对共同农业政策和德国农民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德国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德国银行主席卡拉森(Klasen)和大部分商业界人士都支持控制经济政策,担心大量美元流入会促使马克升值不利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如果在共同体内接受联合浮动汇率,那么这既不得罪美国,还可以把德国从支持美元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可是,这样又会遭到其它成员国的反对,影响与它们的外交关系。1971年5月7日,德国内阁举行会议寻求解决货币危机的办法,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最后决定争取在共同体内寻求联合浮动汇率。同时也决定,如果成员国不能就联合浮动汇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马克将单独浮动。

德国的决定马上激起共同体成员国、特别是法国的强烈批评。5月8日,成员国紧急磋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德法双方。法国认为联合浮动汇率有四点对其不利:第一,经济上,如果把虚弱的法郎与坚挺的马克捆绑一起实行联合浮动汇率,将会迫使法郎升值,不利于法国商品出口,并认为德国联合浮动汇率的建议是“一次反共同体的行动”<sup>[1]</sup>(第107页),其它成员国也这样认为。第二,在政治上,法国也不能接受。由于德国经济实力雄厚、货币坚挺,如果采纳联合浮动汇率将在西欧产生一个“德国马克区”,并且“德国对参与联合浮动汇率的国家进行财政援助更加保证了马克的领导地位”<sup>[1]</sup>(第104页)。这无疑会削弱法国的大国地位。第三,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传统的法国,德国援助参与国的行为对它不是友好而是侮辱性的行动。第四,联合浮动汇率还会损害共同体政策,特别是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是法国不惜冒着欧洲联合失败的危险获得的主要收获(如“空椅子危机”)。如果实现联合浮动汇率机制,法郎升值既阻碍其农产品出口,还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蓬皮杜谴责联合浮动汇率等于是宣判了“共同农业市场的死刑”<sup>[1]</sup>(第104页)。更重要的是,法国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造成的恶果,如果共同体采纳德国的建议,反而会使美国受益匪浅。针对德国的建议,法国提出了反建议,即要求共同体应该联合一致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黄金升值使美元贬值,从而来缓解国际金融危机。

法国的建议德国也是不能接受的。它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原因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德国正在实施摆脱外交孤立的“新东方政策”,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能成功实施的。所以,德国不能得罪美国。正如德国人巴赫所言:“在谈判中有北约的支持对联邦德国是多么的重要啊!”<sup>[2]</sup>(第26页)1970年3月,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正式开始谈判。勃兰特担心“如果不能达成柏林协议,他的外交政策将遭到失败”<sup>[3]</sup>(第141页)。《苏德条约》和《德波协定》的签订,推动了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如果在柏林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两个条约就不会得到德国联邦议会的批准,那就意味着“新东方政策”遭到毁灭性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共同体成员国的经济形势不尽相同、汇率也大不一样等原因,使联合浮动汇率谈判异常艰难,彼此的矛盾难以协调。荷兰财政部长维特文(Johannes Witteveen)说:“共同汇率哪怕上升一点点也许会有经济扩张的危险……或者引起失业率上升。”<sup>[2]</sup>(第39页)德国为了获得西方盟友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决定让步。在外交部长谢尔(Scheel)的参与下,德法两国财政部长彼此的顽固立场作了协调,再一次向共同体成员国表达了德国对欧洲联合的坚定信念。勃兰特也强调指出,“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取得同东方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同东方和解的任何行动都是与我们的西方伙伴密切协商,联邦德国同东方的协定将明确各缔约方现有的条约和协定的义务不受影响”<sup>[4]</sup>(第442-443页)。这一表态也赢得了部长委员会的信任,并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德国实行临时性浮动汇率,但不接受共同体内联合浮动汇率。共同体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道路还很漫长。

## 二、“蛇行于洞”联合浮动汇率机制的建立

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暂停外国银行按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是美国向它国转嫁经济危机的一次卑鄙行动,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毫无疑问,美国新政策使本身就矛盾不断的欧共体雪上加霜,加剧了欧美间的矛盾。更

严重的是,在美国宣布新政策的前几天,就借口解决国内收支平衡问题,让欧洲国家支付美军的驻欧费用,宣称如果不愿意增加支付驻军费用,就相应减少驻军数量。美国的压力激起了欧洲(如法国)的强烈反对。由于德国还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所以,尽管对其转嫁经济危机行径心怀不满,但反应还是比较谨慎。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迫使欧洲放弃固定汇率,外部的压力并没有使共同体成员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8月18日,法国建立了类似比利时的双重外汇机制,即:对外贸和官方交易实行固定汇率,对金融市场采用浮动汇率。欧洲的形势似乎回到5月份德国财政部长席勒(Schiller)所支持的联合浮动汇率的立场。虽然德国反对法国的双重汇率机制,但对其官方浮动汇率表示满意。法国的行为说明共同体成员国在浮动汇率问题上是一大进步,只是共同体汇率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欧洲比以前更加分裂,德国对此深感忧虑。此时,德国与东欧国家的谈判处于关键阶段,勃兰特担心美欧间的分歧“对他的‘新东方政策’会产生负面影响以及美继续在欧洲驻扎等相关问题”<sup>[5]</sup>(第294页)。缺少欧洲和美国的支持,“新东方政策”面临失败的危险。针对这一外交危机,德国积极行动以加速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找到一个坚实的后盾。总理勃兰特马上通知法国驻德大使,表示随时准备与之会谈。随后,德法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虽然存在不少分歧,但双方都有尽快解决货币危机的愿望。

1971年12月,在西方十国集团会议上,各国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引起货币混乱问题在华盛顿的斯密森学会举行会谈,签署《斯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美国同意取消进口10%附加费,相对黄金价格美元贬值8.6%,或者对外国货币贬值7.9%<sup>[5]</sup>(第294页),每盎司黄金的价格由35.2美元上升到38.8美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对黄金的比价保持原来的水平不变,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升值2.8%,马克和瑞士法郎升值7.7%。所有的货币对美元的比价都提高了,特别是法国法郎、英镑(上升8.57%)、德国马克(上升13.58%),从而使法郎对马克的汇率下降。”<sup>[6]</sup>(第258-259页)这有利于法国对德国的出口。德国以实际行动向共同体成员国表明,为了欧洲的团结与统一,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

根据《斯密森协定》,汇率波动幅度由上下各为1%扩大到2.25%,总共为4.5%。共同体于1972年进行了第二次试验。“理事会于3月同意各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官方比价停留在2.25%或者1.125%两个波幅之间,而其它国际货币基金成员国执行的与美元平价之比是4.5%波幅。”<sup>[7]</sup>(第135页)西方把各种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定在固定比价上下各2.25%之间,称之为“洞”,而把共同体成员国货币在汇率波动上形成的紧密关系,即把它们的波动幅度缩小到1.125%,称之为“蛇”。这就是“蛇行于洞”联合浮动汇率(The Snake in the Tunnel)。但是,“经过欧洲共同体努力加以改进的1971年的《斯密森协定》所采用‘蛇行于洞’的方式,作为共同体的工具或者说是政策从来就没有发挥过作用。”<sup>[8]</sup>(第182页)英国加入八周后退出,英镑再次浮动。刚刚开始运作的“蛇行于洞”机制险遭夭折。

共同体实施的“蛇行于洞”联合浮动汇率机制,是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但美元的余威犹在。“蛇行于洞”机制基本上是以美元为中心建立的汇率制度。这说明如果美元继续浮动的话,势必会对共同体的“蛇行于洞”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还决定这一汇率机制的存废。果然,美元在1973年2月再次贬值10%,《斯密森协定》3月就崩溃了。事实上,西欧“蛇行于洞”联合浮动汇率机制“不仅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石油危机所击破,而且还被成员国对解决经济危机分歧和不愿意使他们的政策服从同一目标所打败”<sup>[9]</sup>(第59-60页)。随后,共同体各国货币不是单独浮动就是联合浮动,4.5%的波动幅度已没有哪个国家遵守了。

欧洲金融市场的混乱对德国影响最为严重。它希望英国重新加入联合浮动率机制,维护欧洲的统一,承诺“如果能找到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我们准备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就是说就是要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sup>[10]</sup>(第251页)。1973年3月,德国马克主动升值3%,作为对美元及其它货币实行联合浮动的前提条件。这说明在“蛇行于洞”的体制下,西欧内部联合浮动的幅度是固定的,也是可以调整的。德国

的努力虽然得到英国的积极响应,但打消了法国被马克压着法郎升值的担心,也减轻了法国出口压力。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紧急关头,德国再一次牺牲经济利益以实际行动展示其推进欧洲联合的坚定决心。同年 3 月 11 日,共同体决定实行可以调整的蛇形联合浮动汇率制度。4 月,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Fund-EMCF)建立,它的职责是在成员国发生支付困难时提供短期货币支持,目的是使共同体内汇率制度顺利进行;在外汇市场上对成员国货币进行干预;在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调节,使储备逐渐集中<sup>[11]</sup>(第 199 页)。不过,它只有 14 亿欧洲计算单位,远不能满足成员国干预货币市场的需要。这为顺利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埋下阴影。

由于德国历史上高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战后政府对通货膨胀异常警惕。勃兰特也表明:“经济和金融平衡发展是我们的‘铁律’,在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所创建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我们得小心不能制造新的通货膨胀的源头。”<sup>[10]</sup>(第 266-267 页)同年 6 月,为了共同体的统一、欧洲的联合,德国马克再次升值 5.5%。由于“重新兴起的投机资金的压力随着石油价格上涨日益恶化”<sup>[11]</sup>(第 223 页),为了一己之私,法国单独浮动汇率,再次使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希望遭受挫折。为了把法国保持在“蛇行于洞”机制之内以期欧洲团结统一,德国再次动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助其实现政治目的。财政部长施密特对法国承诺“提供 30 亿美元的贷款,这绝对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提供的最大的一笔货币援助”<sup>[11]</sup>(第 223 页),竟被法国拒绝。理由与 1971 年 5 月拒绝德国的援助大致相同。第一,为了顾全法国的脸面;第二,在民族主义心理作用下,法国不乐意承担对德国人的经济责任;第三,如果接受了援助,那就暗示承认了德国的经济强权。结果,英法等国退出“蛇行于洞”联合浮动汇率机制,共同体成员国只剩下德国等五国留在该机制之内。“蛇”还在,只是“大蛇”变成“小蛇”(Mini-snake),“洞”已破,蛇变成“离洞之蛇”(The Snake leaves the Tunnel)。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希望更是渺茫。

欧洲金融形势更加严峻,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险象环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美元更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寻找避风港,导致欧洲金融市场形势更加恶化,德国马克面临着升值的更大压力。美元比价继续下跌,国际社会掀起抢购黄金风潮,西方金融体制在无政府的市场规律中充满着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各国开始了浮动汇率制度。“共同体似乎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发展没有太多的目的和方向。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共同体中缺少领导者。”<sup>[8]</sup>(第 162 页)不可否认,为了欧洲联合统一,德国在建立“蛇行于洞”机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随着“新东方政策”的成功,德国逐渐摆脱外交孤立,获得了在东西方行动的自由,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势必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 三、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1974 年,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分别当选德法领导人,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面临新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德法关系的急剧升温重新燃起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希望。如果说勃兰特时代领导欧共体前进的力量开始向德国倾斜的话,那么在施密特时期则正式确立了领导共同体的德法轴心。换句话说,德国开始扮演主要角色。

德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减轻了对美国的依赖,双边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例如,在六国发布的抗议美国贸易与货币政策中,明确要求提高黄金价格、美元贬值。此前,德国从没有过这样的要求。德斯坦则作了更形象的描述,“在过去这些年中,美国人已习惯于他们一吹哨,德国人马上就到。他们知道我们离不了他们。但现在德国变了,德国已重新建设起来,恢复了经济活力,从而也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应该让美国人不要以为他们只需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就会服从”<sup>[12]</sup>(第 93 页)。而德法关系明显升温。施密特成为“一个坚决主张把德法友谊以及德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放在第一位的亲法派”。他解释说:“并非由于我们对大西洋美国伙伴的失望,而主要是因为我在越来越看清我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态势。”<sup>[13]</sup>(第 366 页)国际关系的转变、德法关系的升温蕴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新的机遇。

此时,德国国内形势也迫切要求加速欧洲经济联合的步伐。施密特执政初期,“虽然联邦德国的生

业情况仍然要比多数西欧国家好得多,但由于德国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六个最大的工业国家里是最低的,德国在国际增长速度上开始落后……在70年代后期,德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1975年,有超过100万人失业”<sup>[14]</sup>(第150-151页)。经济继续增长却不能降低失业率,德国所面临的“每种困难都说明,失业是结构性矛盾产生的而不是经济衰退造成的”<sup>[15]</sup>(第118页)。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共同体汇率混乱问题,这是各种矛盾的根源。施密特通过积极反贸易保护、维护外贸出口等经济手段寻求稳定共同体汇率。这又与法国传统经济政策产生矛盾。因为“传统的原因,法国把联邦德国视为威胁和挑战。出于经济、政治和选举的原因,改变德法经济实力间的不平衡是法国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sup>[16]</sup>(第184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法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为主要经济政策。德法间的矛盾又回到了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之初的问题,即“经济主义”还是“货币主义”。但德法关系的转暖为解决双方矛盾奠定了良好的前提,国际形势的发展则为之添加了催化剂。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加强了德国加速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决心。1973年爆发的“十月战争”产生了所谓的“石油危机”。这严重影响了依赖石油进口的欧共体,不仅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不可否认,“通货膨胀率在1973年大幅度上涨。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货币波动和早先的信贷政策”<sup>[6]</sup>(第271页)。严峻的通货膨胀影响到西欧国家收支平衡,有的国家开始重操贸易保护主义(如意大利)限制进口。德国急需国外市场,对贸易保护主义尤为关切,密切关注国际货币汇率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意大利等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自然遭到它的反对。因为假若西欧效仿意大利的话,德国出口贸易不仅遭到重创,更严重的是,共同体还有解体的危险。施密特紧急会晤德斯坦,磋商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德国“政治意图是阻止法国效仿意大利”<sup>[11]</sup>(第248页)。在德法协议中,德斯坦也一反法国过去以通货膨胀刺激的出口政策,认为应该坚决控制通货膨胀,表明“法国经济政策日益与联邦德国一致”<sup>[11]</sup>(第251页),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法国重回“蛇行于洞”联合浮动汇率机制。其实,这是法国“防止建立马克区”<sup>[19]</sup>(第39页)采取的举措,它认为这样既可冲淡马克的影响,还可向其它成员国彰显法德是并驾齐驱的欧洲大国。

法国主要是从其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的,从德斯坦与莫内的一次谈话中可得到证明。莫内对德斯坦说:“我看得出,你已经明白,要想单枪匹马地解决面临的问题,法国已力不从心。”<sup>[12]</sup>(第83页)他暗示德斯坦,德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法国已经难以单独领导欧共体。所以,德斯坦决定改变前政府联英制德的策略,与其修好,强化法德轴心。德斯坦作为前财政部长,深知只能仿效德国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另外,欧洲形势的发展也是促使德法接近的原因。就在欧洲经济一体化遭遇困境之际,英国于1974年4月就加入欧共体提出重新谈判要求,还就去留共同体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尽管(希思)首相有很好的打算,英国却已经开始获得‘难以对付的伙伴’的称号。”<sup>[17]</sup>(第172页)这不仅使其它成员国再次怀疑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真实用意,而且,留给它们的印象“还是像以前那样,由德国人领导着(欧洲共同体)向前进”<sup>[11]</sup>(第249页),预示着德国在欧洲联合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主要的作用。

英国的要求自然遭到法国强烈反对。虽然施密特也“对英国极为愤怒”<sup>[18]</sup>(第129页),但为了维护欧洲的团结与统一,在1975年都柏林欧洲理事会上,积极调解英法矛盾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作出一定的牺牲,英法最终也得到妥协,欧共体顺利渡过解体危机。借此机会,德国宣布,年底前将为它的欧洲伙伴提出新的欧洲联合办法,暗示为重新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作出努力,以加速欧洲联合步伐。

德美间矛盾的增长也是德国加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原因。“在卡特(Carter)政府时期,德美之间关系出现了乌云。”<sup>[19]</sup>(第130页)1977年美国巨大的支付赤字严重伤害了美元的坚挺地位,“从1977年2月下跌了十分之一,到该年的秋天,又下跌了十分之一”<sup>[7]</sup>(第138页)。美元的疲软就意味着马克的升值,对德国的出口极为不利。“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对美国的金融政策采取更加批评的姿态。”“美元的不稳和随后卡特总统早期的重新通货膨胀的政策使马克面临升值的压力,更使德国对建立经济货币体系的吸引力。”<sup>[11]</sup>(第111页)如果德国政治上屈服于美国,马克升值将会沉重打击其经济。德美间的矛盾“作为联合德法关系的因素,80年代重新出现”<sup>[11]</sup>(第252页),更加强了施密

特联合法国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决心。

法国两次退出“蛇行于洞”机制,不仅影响经济稳定,而且还给十分“爱面子”的德国以巨大羞辱。同时,也使法国意识到德国已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激起法国的忧虑。所以,法国决定“加强与德国的金融联系,不仅使法国在两国经济来往中获利,而且还能把德国更紧密地拴在欧洲”<sup>[1]</sup>(第 279 页),一定要实现“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这是法国改变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由于两次脱离“蛇行于洞”的经历,德斯坦说:“同一条蛇不可能复活两次!经验已告诉我们:最疲软的货币总是单独承担维持汇率的重担。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就无法使欧洲货币体系运转起来。应该考虑另一种形式。”<sup>[12]</sup>(第 98 页)这说明法国这条“蛇”不可能重回旧的“洞”中,它期望建立新的货币机制,但遭到德国联邦银行和财政部的反对。它们认为这将会控制住币值,限制其干预经济的能力。对德国人来说,缩小了的“‘蛇行于洞’浮动汇率机制运作良好”<sup>[1]</sup>(第 281 页)。因为留在该机制内基本上是工业发达国家;其贸易互补性强,更能维护内部稳定。况且,加强“小蛇”成员国间的货币联系还能保护德国免受进口膨胀之苦。开始,施密特对法国的建议也有些“善意的怀疑”,只是没有完全否决。

虽然施密特对法国的建议有些怀疑,但还是决定利用此机会加速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1978 年 2 月,施密特“希望对货币联盟采取重大的行动,他脑子里设想的是建立在共同储备金库基础上的欧洲货币共同体”<sup>[20]</sup>(第 223-224 页),远不是法国建议的货币新机制。更令人吃惊的是,1978 年 4 月 2 日,德法会晤朗布依埃市(Rambouillet),施密特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几天之后,施密特在哥本哈根的欧洲理事会上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雄心勃勃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是施密特在没有与联邦银行和财政部协商的情况下提出的,但维护欧洲统一与团结是德国既定的外交政策。一个分裂的欧洲,德国人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施密特始终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正如德斯坦所说:“货币联合主要是我的主意,而防务联合则是施密特总理的倡议。”<sup>[12]</sup>(第 93 页)除德国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坚强决心和举措外,也因为“法郎被迫两次退出蛇形汇率机制所带来的耻辱才使德斯坦下决心改革经济政策,……执行强势法郎政策才导致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sup>[16]</sup>(第 40 页)。1978 年 7 月,德法首脑在不来梅共同体首脑峰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简称 EMS)的建议。

70 年代末,德法两国在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诞生的欧洲货币体系明显的是德法双边利益的集中体现,确定了两国在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sup>[1]</sup>(第 277 页)德法充分吸取“蛇行于洞”机制的经验教训,决定创立一个新的参考货币,即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简称 ECU),简称埃居,以维持对内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和对外的联合浮动汇率制度,并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代替欧洲计算单位(EUA)作为中心汇率的计算标准,作为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结算手段,也可用作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另外,共同体还计划扩大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简称 EMF),把各国 20%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集中在一起,加强干预货币市场的能力,保证共同体内部市场的汇率稳定。德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欧洲共同体的历史上,欧洲货币体系无可争议的说明是在德国领导下的第一个主要的行动”<sup>[21]</sup>(第 7 页)。可以说,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努力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sup>[14]</sup>(第 157 页)。

欧洲货币体系密切了成员国休戚相关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各国货币的稳定,是在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是货币联盟和统一货币的胚胎,但是离统一货币还遥远得很。”<sup>[22]</sup>(第 83-84 页)无论怎么评价,欧洲货币体系的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相结合的汇率机制,在国际金融动荡的 70 年代,对稳定共同体内部汇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加速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德国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发挥了主要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 1 ] Simonina Haig. 1985. *The Privileged Partnership—Franco-German Relation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69—198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2 ] Szász André. 1999. *The Road to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Macmillan: Macmillan Press LTD.
- [ 3 ] Ninkovich, Frank A. 1995.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 [ 4 ] [西德]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 [ 5 ] Hanrieder, Wolfram F. 1989. *Germany, America, Europe For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6 ] Grosse, Alfred. 1980.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 Continuum.
- [ 7 ] Pinder, John. 1995. *European Community: The Building of a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8 ] Urwin, Derek W. 1991. *The Community of Europe: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 9 ] Hendriks Gisela & Annette Morgan. 2001. *The Franco-German Axi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 10 ] Brandt, Willy. 1978. *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 trans. J. H. Brownjohn. London: Collins.
- [ 11 ] 武贻康:《欧洲经济共同体》,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 12 ] [法] 吉斯卡尔·德斯坦:《德斯坦回忆录——政权与人生》,侯贵信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 [ 13 ]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 14 ] Lee, Sabine. 2001. *Victory in Europe—Britain and Germany since 1945*. Harlow, Essex: Longman.
- [ 15 ] Abelshausen, Werner. 1983.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8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 16 ] Howarth, David J. 2001. *The French Road to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 [ 17 ] George, Stephen. 1998. *An Awkward Partner: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8 ] Pedersen, Thomas. 1998. *Germany, Fr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A Realist Interpre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 [ 19 ] Feld, Werner J. 1981. *West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hanging Interests and Competing Policy Objectives*. New York: Publishers.
- [ 20 ] Jenkins, Roy. 1989. *European Diary: 1977—1981*. London: Collins.
- [ 21 ] Lankowski, Carl F. 1993.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eyond Hegemony and Containment?*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 Ltd.
- [ 22 ] 陈乐民:《东欧剧变与欧洲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责任编辑 桂 莉)